

共同富裕的多元认知与共识的达成

■ 贾玉娇

共同富裕社会共识是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的精神内核，是推进超然于人类社会发展既有轨道的新道路的内生动力。然而，由共同富裕所具有的总体性的理论与实践内涵可知，在复杂性的发展环境中、限定性的发展条件下与限制性的发展基础上，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必然充满诸多矛盾与张力。在此背景下，社会认知与国家建构、社会认知与信息传播、社会认知的客观限定性与主观超越性等张力加大，同时认知塑造、环境塑造、感知塑造等社会共识的塑造机制相对滞后，造成共同富裕社会认知的多元化。为引导社会在一些根本性、基础性、原则性、方向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允许社会在一些具体层面和维度上存在不影响社会凝聚与社会团结这一最低限度上的认知差异，聚焦多元主体对共同富裕信息的选择性与差异化阐释的情况，整理不同主体对共同富裕的关注旨趣与共同富裕话语状况，阐释共同富裕认知多元化的原因，进而在达成共同富裕共识“有力条件”和“有利条件”下，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体系与机制建设思路。

[关键词] 共同富裕；社会认知；社会共识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24)08-018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发展型社会政策到共同富裕型社会政策研究”(22JZD182)

贾玉娇，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012)

2021年8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1]的重大命题，并详细表述了共同富裕的人民性、全面性、历史性、发展性、阶段性、差序性的理论与实践内涵，揭示了共同富裕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与制宜化的实践特征。这一命题的丰富内涵表明，在复杂性的发展环境中、限定性的发展条件下与限制性的发展基础上，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必然充满诸多矛盾与张力，这必然形成共同富裕的多元社会认知。这并非是一个特殊性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既有研究表明，那些深入人心且具有普遍意义的主张、话语往往被不同的社会认识框架所解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共识对政策的有效推行与社会系统性变革具有重要影响，而在复杂程度不断增强的现代社会，多元社会认知的共识达成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如何达成共同富裕的社会共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为此,本研究以社会认知是社会行动的前提,亦即社会行动是实践中的社会认知为研究假设,基于社会共识是影响政策推行与社会系统性建构的重要因素这一基本论断,审视共同富裕的多元社会认知现状,分析造成社会认知多元化的原因,进而探讨共同富裕社会共识达成的路径。

一、共同富裕社会共识达成的必要性

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认知与共识所具有的“实体性”结构的意义往往容易被忽视。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曾提出“自我实现预言”(或“自证预言”),即某种期望、信念会使人们按所想象的情境去行动,结果最初并不真实的预言会应验,变成真实的后果。^{[2](P286)}从人类历史上看,纵观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每一次的重大社会变革都是某种社会共识的现实呈现。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社会秩序的确立,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说基础之上的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理想的商品化实现机制这一社会共识的外化;19世纪末期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初步达成关于人的商品化与去商品化张力调控范畴这一社会共识的结果^{[3](P7)};20世纪中期福利国家的建立是不同利益群体达成关于人的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相互促进这一社会共识的结果,而20世纪中后期的福利国家危机则是这场共识的瓦解。由此可见,社会共识对社会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从学术研究上看,关于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理论的经典议题。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的历程上看,如何构建社会共识,从而将国家发展主张转变为社会认知与共识,进而转变为社会行动与社会现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议题,并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始终。

为此,在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时期,社会共识达成的必要性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现代社会共识达成的张力发生变化。伴随社会复杂程度的加深、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强,社会共识达成的张力加大。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多元社会认知的张力、有效凝聚社会共识,社会系统建设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系统的稳定可能会面临较大挑战。因此,加大社会共识达成问题的研究力度十分必要。另一方面是共同富裕内涵蕴含的张力较大。虽然自近现代以来,实现社会普遍富裕成为隐埋在现代化与其社会合法性之中的共识性内容,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发展蓝图也曾提出过相近意思的表述,但是“共同富裕”往往作为一种思想中的存在,像中国共产党鲜明提出“共同富裕”,并将其作为国家社会建设目标的做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由前文可知,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超越性与共同富裕过程的现实制约性,使其内部蕴含诸多矛盾与张力。因此,作为国家社会建设目标的“共同富裕”,其本身包含着对整体的、复杂的社会建设意志与具体的、局部的社会认知间的张力调控以及促进共同富裕的整体性内涵转化为社会主观认知,促使国家意志与社会认知达成辩证统一的过程。

二、共同富裕社会共识达成的影响因素与面临的挑战

(一)社会共识达成的张力

社会共识问题产生的结构性前提是社会认知的自在性^①与社会认知的建构性。由二者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笔者凝练出社会共识达成的三大基本张力。

第一大张力为社会认知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张力。社会共识是国家发展与建设的宏观主张通过一系列的內化机制转化为社会成员的主观认知,并获得其认同。在此过程中,以人为观察的中心,

如果说国家建构力量具有一种客观的结构性,那么存在于人意识之中的源于既有生活体验而形成的主观认知,因是人社会行为发出的指导性框架,亦即是一种存在于人的主观性之中的客观性,因此同样具有结构性。由此可知,社会共识的达成是上述两种结构性力量相互较量,争取社会主观认同的过程。

第二大张力为社会认知与信息传播之间的张力。此张力由上一张力延伸而来,考察的是国家意志或主张向社会传播的形式与社会认知的关系。基于话语理论可知,话语这一信息传播的基本形式对社会认知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包含思想、价值观和态度等意义的符号,如音乐、影视、动画、美术、手办、小视频等,同样会对社会认知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些与社会大众认知水平、能力和习惯相符合的话语与符号的传播形式可以起到较好的社会接受与认同效果,反之则不然。^{[4] (P2)}因此,这一张力的本质是在争夺人的主观认同阵地时,不同思潮主导下的话语与输出形式之间的较量。

第三大张力为社会认知的客观限定性与主观超越性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源于国家发展主张所具有的基于现实基础同时又超然于现实基础的特性。具体可从以下两个维度对上述论断做出考察:其一为国家发展主张具有整体性和全局性,必然超然于个体所处的具体的现实情境和其基于此而形成的具有一定局限性的整体感知;其二为国家发展主张具有未来指向性,即国家发展主张是以未来的国家发展状态为参照系,进而对当下的社会发展进行引导干预,从而使一国发展兼具阶段性与连续性,促使社会发生由“进行时”中的量变向“未来时”中的质变转化。这必然使社会认知处于当下社会基础的制约性与未来社会发展的牵引性的持续拉扯之中。

(二)社会共识的塑造机制

在明确社会共识张力的前提下,对社会共识张力做出理性回应,形成相应的社会共识塑造机制。从总体上看,塑造社会共识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可分解出以下三个机制。

第一,认知塑造机制。塑造社会认知是达成社会共识的关键步骤,是社会个体获取关于某种价值和意义系统先验性认知的重要机制。这里的先验性认知强调的是,储存于个体头脑且对个体行为产生指导作用的认知框架并非完全源于个体的实践经验,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来自他人的教导,亦即通过本部分提出的塑造机制而获得。这种先验性认知使社会个体形成某种确信。所谓认知塑造是指通过直接教育与间接濡染的形式,将承载某种特定意义的符号传播给受众,从而将国家发展与建设的意志或主张转化为每一社会个体的主观认知。

认知塑造机制的内涵包括制度载体、传播内容与传播效能三个方面。从认知塑造机制的制度载体上看,直接教育亦即直接塑造机制的制度载体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间接濡染亦即间接塑造机制的制度载体为那些将多元意义符号散播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机制,如充斥在我们生活之中的各种媒介,其形式多样,不仅包括媒体,如音乐媒体、传统影视媒体和纸媒、互联网等,还包括将人与意义世界建立起关联的所有介质,如美术、手办、服饰、饮食、生活用具等。由媒介社会理论可知,在当代以各种媒介传递出来的纷繁复杂的符号,其隐喻的多元的价值和意义交织成一个空前复杂的系统^[5]。从传播内容上看,能被人们头脑中既有的稳定的社会认知框架所能接收、理解并产生共鸣的内容,可产生显著的塑造社会认知的作用。从传播效能上看,直接塑造机制中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间接塑造机制中的隐秘教育对学校教育效能具有显著的影响,同向教育会产生事半功倍的认知塑造效能;与学校正向教育相反,学校教育内部甚至存在反向作用力,如教师的言行不一等,都会极大地削弱认知塑造机制效能,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第二,环境塑造机制。这里的环境不是自然环境、物质环境,而是社会环境,即由正式制度与非

正式制度所构成的环境以及由各种意义符号构成的人文社会信息环境。环境塑造机制的作用往往发生在当个体通过认知塑造机制获得某种先验性认知并按照此认知发出社会行为后接收到社会反馈的时候。如果社会个体接收到的是积极的社会反馈,就会产生“认知确信”,“认知确信”是形成国家与社会共识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如果社会个体接收到的是消极的社会反馈,就会产生“认知怀疑”。虽然由于个体活动具有时空局限性,个体认知的环境检验必然具有时空的局限性,但是这种具有局限性的认知体验对于个体来说是真实的,这往往将导致个体基于这种局限性的认知体验而对整个认知内容产生质疑。因此,这给环境塑造机制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得益彰的认知塑造机制与环境塑造机制会使社会形成“认知确信”,进而推动社会共识达成与共识水平提高。

第三,感知塑造机制。如果说认知塑造机制侧重于实现共识性认知内容的社会植入,环境塑造机制侧重于实现个体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形成对植入内容的认同,那么感知塑造机制则侧重于实现源于个体对植入内容主观感知的认同。如果说认知塑造机制是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上的社会共识达成机制,环境塑造机制是基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维度上的社会共识达成机制,那么感知塑造机制则是不同世代基于社会发展成果感知维度上的社会共识达成机制。具体说来,这一机制主要反映的是因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起点不同,不同世代对一定历史时期中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观感知不同,进而影响他们对理论和政策主张的认同。例如,“50后”和现在的“10后”对我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感知就存在显著差异,“50后”往往有较高的获得感。对于和“50后”一样的大部分人而言,虽然他们会有因横向上与其他高收入社会群体相比较而产生的差距感,但是由纵向上基于个体生命历程而形成的社会发展成就的满足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前面的差距感,从而在个体感知系统中形成社会发展正向感知剩余,有助于增进对共同富裕共识性内容的认同。

(三)社会共识达成面临的挑战

基于前文分析可知,社会共识达成面临的挑战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共识张力的加大,另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共识塑造机制的不足。因此,社会共识达成面临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社会共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维度上看,随着影响个体社会认知与国家建构相互作用因素的不断增多,社会共识达成的张力加大给国家发展行之有效的认知塑造机制提出迫切的现实要求。其二,从社会共识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维度上看,基于各种意义符号充斥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中并展开争夺个体认知系统的局面^{[6] [P3]},国家如何推动建立系统化的人文社会信息环境系统,实现共识性内容的隐秘化植入,实现学校、社会常规化教育与人文社会信息环境之间的协同一致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其三,从社会共识的主观与客观关系的维度上看,社会个体所具有的现实性、具体性特征与社会共识所具有的超越性、引领性之间的张力,要求国家加大力度建设个体感知塑造机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化带来的个体化程度的加深,提高社会个体从整体看自身的意识及思辨能力,提升个体对社会发展成果的感知能力与感知水平具有较强的紧迫性。

三、共同富裕社会认知的多元化及原因

在上述挑战下,当前我国社会对共同富裕的认知具有多元化特征。本部分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聚焦多元主体对共同富裕信息的选择性与差异化阐释的情况,整理不同主体对共同富裕的关注旨趣与共同富裕话语重构的情况,分析其对共同富裕共识达成的影响,进而阐释导致共同富裕认知多元化的原因。

(一)共同富裕的多元认知现状

共同富裕已然成为社会各界言说的共同对象。按照言说主体类型,可将共同富裕文本划分为政策文本(包含国家领导人思想与主张的文字表述)、学术文本(学者思想和观点的文字表述)和社会文本(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观点,观点来源于媒体采访)。为厘清共同富裕社会认知状况,笔者在整理2012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系列论述,中国知网上以共同富裕为篇名和关键词的期刊论文以及《北京日报》发布的街头采访《我心中的共同富裕》,《今晚》发布的街头采访《你怎么理解共同富裕?》,美丽浙江平台发布的街头采访《我心中的共同富裕》等资料的基础上,析出共同富裕关键词。围绕上述关键词,对共同富裕的政策文本、学术文本和社会文本进行比较(见表1),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出不同文本的阐释点的分布情况,从而厘清多元共同富裕认知的共识点、差异点和空白点。由共同富裕认知状况可以发现以下三点。

第一,多元认知主体在共同富裕的认知广度、深度和共识度上存在一定差异。其一,多元认知主体在共同富裕的认知广度上存在一定差异。政策文本和学术文本的认知广度相对较大,能够对共同富裕的绝大部分内涵做出认知回应,而社会的认知广度相对较小,对“共同富裕历程”“发展与共享”“阶段性与长期性”等认知不足。其二,多元主体在共同富裕的认知深度上存在一定差异。笔者通过比较发现,政策文本与学术文本对共同富裕的认知较深,而社会文本的认知有待加深,如社会对“共同的时间意涵”“共同富裕实践特征”“共同富裕实现标准”“共同富裕社会建设(包含共同富裕中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关系)”等认知不够。其三,多元主体关于共同富裕的共识度存在一定差异。从表1可以看到,政策文本与学术文本对共同富裕的共识度相对较高,相比之下,由于社会文本

表1 共同富裕内涵多元认知

关键词	政策文本	学术文本	社会文本
共同 内涵	全体人民;非同步性,动态,分阶段	关注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非同步; 非同时	关注中下阶层;全民;各个阶 层
富裕 内涵	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人的全面发展;美 好生活;生活品质;国家实力;社会财富; 人民生活质量;生产力水平	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人的全面发展; 美好生活;生活品质;国家实力;社会 财富;人民生活质量;生产力水平	口袋有钱,财务自由;关注教 育就业求医问药等优质公共 服务;无忧无虑,吃穿不愁
共同 富裕 内涵	共享;收入差距缩小;全体人民普遍达到 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 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 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共享;收入差距缩小,消除两极分化, 不断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与群体 差距;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生 活丰裕、生态优美、社会和谐、公共服 务体系完善;非同等性,承认合理的差 距	孩子共同享受良好的教育, 树立正确的三观;青壮年能 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衣食住 行方面拥有富足的生活;老 年人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有良好的医疗环境和平 等的医保待遇;看重简单的 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与结果
共同 富裕 水平	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 展规律循序渐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全体人民在共 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更可持续	可持续,在关系的限定中确定水平;普 遍富裕与适度差距的统一;动态考量	物质极大丰富;基本需求都 能得到满足
共同 富裕 历程	将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远景目标相结合;统筹不同发展阶 段的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段特点;先富 带动后富、先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 富裕;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层次 的递进性	将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远景目标相结合;统筹不同发展 阶段的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段特 点;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帮助后富,最 终实现共同富裕;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 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实现层次的递进性	关注不足

续表1

国家建设	强调国家责任	强调国家责任	强调国家责任
社会建设	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共建共富,人人参与、人人努力;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	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系统性讨论不足	在国家给出好政策的同时,自己也要做出努力实现富裕
实践特征	总体性、全局性、整体性、统筹性、渐进性、差异性、全民性、全面性、共创性	总体性、全局性、整体性、统筹性、渐进性、差异性、全民性、全面性、共创性	全民性、差异性
实现标准	全体人民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中等收入阶层在数量上占主体;收入、财产和公共服务供给均衡;资源的均衡性增长;可考察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吃穿不愁,无忧无虑
分配原则	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 均衡分配;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公平;均等化;平等参与、平等发展	平均主义;共同富裕不等于平等主义,而是社会的各行各业能够平稳发展;合理差异范畴内的共同富裕
分配内容	分配收入、公共资源(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扶幼)、机会、环境资源、文化资源	分配收入、公共资源(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扶幼)、机会、环境资源、文化资源	分配收入、公共资源(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扶幼)、机会、环境资源、文化资源
发展与共享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发展、物质基础是共同富裕的前提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发展、物质基础是共同富裕的前提	关注不足
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富裕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共同富裕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共同富裕是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阶段性 with 长期性	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久久为功	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久久为功	关注不足

对共同富裕的认知具有现实化、具体化、个体化特征,使得社会文本对共同富裕的部分内涵,如“富裕的内涵”“共同富裕水平”“共同富裕特征”“分配原则”等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

第二,表1大致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同富裕认知的共识点和差异点。一方面,多元主体在“共同的范畴(全体人民)”“富裕内涵”“共同富裕中的国家责任”“分配内容”等方面达成较高的共识。另一方面,政策文本、学术文本二者与社会文本在“共同的时间内涵”“共同富裕特征”“共同富裕水平”“分配原则”等方面存在一定认知差异。

第三,表1显现出政策文本与学术文本对共同富裕的阐释存在短板。这一方面体现在对部分共同富裕内涵的阐释不够系统、深入,如“共同富裕中的社会建设”,虽然在政策文本中能够找到相关表述,但是在学术文本中的学理性阐释不足以及向社会大众的传播力度不够。再如“共同富裕实现标准”,学术文本的阐释较为模糊,如用中产比例、公共服务供给均衡度、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标准进行衡量,这些衡量标准不仅考量的内容单一,而且难以真实反映社会收入与资源获得的合理性差异情况。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学术文本对共同富裕内涵的阐释不完整,存在阐释盲点,具体表现在:未对共同富裕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展开讨论,没有厘清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与

个体的责任边界,各个主体内部的子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与整体框架中的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未对共同富裕不同发展阶段中的限制性与限定性因素及其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做出充分阐释;未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存在形态、心理期待、主观感知等特征及其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做出阐释;未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水平与向社会转移支付水平的平衡点进行充分探讨;未对如何激发社会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情感的策略与路径做出足够阐释。

(二)共同富裕社会认知多元化的原因

1.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由上述分析可知,社会认知多元化抑或差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成员对共同富裕话语存在部分无感或钝感,而从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方面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还尚不彻底。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能转变为物质力量。^{[7](P11)}因此,彻底的理论成为形塑社会认知、达成社会共识、形塑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理论的彻底化面临以下两个挑战。

一是源于理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天然沟壑,即抽象的、概括的、具有时空延展力的理论话语与具体的、现时的社会个体经验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话语接收者不同的生活阅历、生活体悟、社会感知和生活态度决定了他们对同一个话语的不同理解。实际上,那些深入人心的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主张已经被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框架所肢解和再演绎。伴随社会多元化、复杂化以及个体生活体悟多样化程度加剧,多元文化元素流行,进一步拉大了这一张力。此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同世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是不同的,使得他们基于个体生命历程比较而形成的富裕感知不同。其中社会新生代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的起点相对较高,基于纵向生命历程比较而产生的获得感相对较小,还会在与高收入群体的横向比较中产生落差感。

二是源于理论建构者的理论思维能力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的张力。作为总体性概念的共同富裕,其内涵的丰富性与系统性蕴含大量有待进一步深入阐释的理论问题:如共同富裕的局部性与整体性;共同富裕的阶段性与长期性;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下如何看待人民整体利益与具体的人的利益,也就是如何看待共同富裕实现中部分群体的潜在利益“受损”。这里的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个体对休息、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满足。其中蕴含的又一个张力是,随着市场化与法制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体本位与利己主义思想不断深入人心,而共同富裕实现正是通过在对既有制度优缺点的扬弃中不断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而这必然对部分群体产生影响。因此,接下来需要阐释的问题就是,如何让社会对共同富裕形成感性与理性双重维度上的认知。也就是在强调共同富裕理性化、科学化测量指标的同时,强化社会成员对共同富裕的感性认识与感性情感。

2.共同富裕共识性内容的传播体系尚不完善

这里的共识性内容的传播体系包括共同富裕话语(政策文本和学术文本)的传播载体、形式以及共识性内容在日常生活中的隐秘化传播机制。在当今社会,信息环境空前复杂,人们的信息来源多元化,作为社会认知得以形成的“知识库”的构成越来越复杂,由此产生社会认知塑造的“去符号化”和“被符号化”^{[8](P19)}。在共识性内容的传播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社会认知不可避免地多元化。具体说来,共识性内容向社会植入的载体主要是通过话语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介质。从我国目前共识性内容的传播上看,存在重话语传播、轻渗透型介质打造,重共同富裕话语正式传播、轻共同富裕话语非正式传播的问题。

从话语传播的主体上看,学校、媒体、互联网、家庭等构成有机传播体系。从话语的传播过程上看,由话语是对人的认知与思维的反映可知,话语的传播本质是不同认知框架和思维交流与形成

“共意”的过程。因此,此过程必然有“翻译”或“转译”这一话语转化,亦即不同认知与思维的接洽过程。然而,共同富裕话语的传播载体及形式主要为学校教育、官方媒体(含网络、电视、纸媒和出版物)宣传、党组织学习、社会宣讲团宣讲等。这虽然对社会认知共同富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这一话语传播系统是不完整的,导致话语转译不彻底,故而影响话语传播效能。

作为共识性内容传播的“隐秘化”机制往往对社会共识的建构起到重要影响。所谓“隐秘化”传播是指充斥于社会成员日常生活之中以各种介质形式存在的符号及其形成的意义网络。在后现代社会,人类社会普遍陷入令人迷惑的符号网,使得投射到人脑中的意义变换迅速,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于是,符号的表意能力被模糊了,且变得混乱不清。同时,具有创造才情、思路清晰且善于反思的受众逐渐形成,他们会用质疑和试探性的眼光审视所有符号,由此形成社会认知塑造的“去符号化”。但与此同时,人们会在随机遇到的符号中选取他们喜欢的符号,并接受该符号承载的意义。此外,对符号传播效应熟悉的符号制造者,会通过迎合消费者或受众的心理来达到符号传播与意义传输的目的。因此,社会认知会处于某种更加隐秘的“再符号化”塑造中。

3.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相对滞后

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如何充分发挥社会参与共同富裕的主观能动性,夯实夯实共同富裕的社会根基成为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如果将共同富裕主体进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划分,那么从目前主体的建设上看,共同富裕国家建设水平最高而社会建设水平相对较低,具体表现为共同富裕的社会共同体意识、社会共同体情感和社会主体发育水平等有待提高。

共同富裕社会共同体是社会成员戮力同心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机体,与共同富裕社会共识为一体两面。因此,激发共同富裕社会共同体意识和情感成为关键。然而,目前我国共同富裕社会共同体意识还存有一定分歧。如部分社会成员认为应该采取能够体现合理差异的分配原则,共同富裕不等同于平均主义,然而还有一些社会成员认为应该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再如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共同富裕应该是物质极大丰富,但还有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共同富裕应该是基本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此外,共同富裕社会共同体情感还存在一定的淡漠问题。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一些社会成员显现出较为明显的超越其自身狭隘利益的、对社会各个群体同情共感的能力,但是这一能力在现代科学化、理性化的悖论下被弱化,即与人的理性能力并重的感性能力逐渐在科学化、理性化、逻辑化、法治化不断强化的同时而有所弱化。同时,在社会良好道德秩序及其情感基础被侵蚀的背景下,社会成员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更倾向于用理性、逻辑、法治的方式看待和解决问题。虽然人的理性不断被强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系现代社会共同体,但是作为共同体的另一维系机制——人的感性的弱化,则会对共同体产生不利影响。过于理性化、逻辑化、法治化会导致社会互动的韧性缺失,从而有损社会凝聚。此外,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体发育水平上看,目前我国还尚未完全形成“以社治社”“以社引社”“以社建社”的社会基础与有效机制。

四、共同富裕社会共识达成的条件与实现

(一)共同富裕社会共识达成的目标与条件

国家推动共同富裕共识的达成并不是要消除社会对共同富裕的多元认知,而是引导社会在一些根本性、基础性、原则性、方向性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允许社会在一些具体层面和维度上存在不影响社会凝聚与社会团结这一最低限度上的认知差异。虽然共同富裕社会共识的达成面临一些

挑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推动共同富裕社会共识的达成中有一个“有力条件”和一个“有利条件”。其中的“有力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共同富裕的总体性认知与论述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不断提升的国家治理能力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实践支撑。其中的“有利条件”,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成效深入人心,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国家权威不断增强,从而成为共同富裕社会共同体意识与情感的生成来源。

(二)共同富裕社会共识达成的实现机制

第一,深入推进共同富裕理论研究,完善共同富裕话语体系。一是进一步提高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思维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9]理论思维决定了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的效能高低,是研究者生成理论自觉、凝练理论命题、形成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二是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深入推进共同富裕理论研究。由前文分析可知,共同富裕是一场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基于现有的人类社会制度文明而又蕴含着超越既有人类社会制度文明的思想探索与实践历程。因此,基于西方现代化主流思想是难以形成彻底的共同富裕理论的。只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并从中国式现代化中凝练共同富裕基本概念与理论命题,才能不断发展与丰富共同富裕理论。三是构建共同富裕理论框架,拓深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论阐释,填补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空白。四是展开跨学科理论研究,避免不同学科对共同富裕理论阐释的碎片化问题,推进共同富裕理论的有机性和系统性研究,避免对共同富裕进行片段式、局部化的理解。五是形成理论话语、政策话语与日常话语三位一体的共同富裕话语体系,推进理论话语与政策话语的生活化、通俗化转化。

第二,加强共同富裕话语传播体系建设,构建话语正向体验的环境系统。一是构建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话语传播体系,形成由点到面的话语“差序传播”机制。所谓“差序传播”是用来描述共同富裕话语由少数关键群体沿着血缘、地缘与业缘的亲疏远近关系逐层向外推出,进而不断扩大话语传播范围的过程。此过程实现两个关键性转化:社会个体由共同富裕话语的接收者向传播者的转化和理论话语、政策话语向日常话语的真实转化。二是构建将意义“隐匿”起来的符号传播系统,顺应信息化时代符号意义的传播规律,注重对人的潜意识产生影响的符号系统的建构。以一些非主流文化的传播符号构建为例,承载非主流文化的符号形式往往多元、时尚且系统,将“正式”的话语“非正式”地说,将带有“价值”的意义符号“去价值化”地表达,才更有助于达成符号意义传播的目标。三是形成实现话语认知正向体验的环境。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有效执行,将共同富裕话语转变为真实的政策执行者的行动,营造共同富裕的实践氛围,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话语的社会认同。

第三,进行共同富裕社会共同体建设,强化共同富裕的社会感性认知。一是加强共同富裕的社会感性教育,注重社会感性意识、感性情感教育,提升社会成员超越自我与他者差异的同情共感的能力。建设从幼儿到大学的感性教育体系,以夯实社会共同体得以形成的情感之基。二是加强具有社会共同体意识的社会主体建设,并强化这部分群体的社会示范效应。具体说来,重视网络时代的网络社会主体培育,将网络主播纳为社会公众人物,加强对网络主播权责的规制,同时形成网络主播的感性教育机制,促进“网红”或网络主播成为共同富裕社会共同体意识与情感的传播者;在提高全社会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形成能力越强公共责任越大的正向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成熟市场的标志之一;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共同富裕社会共同体意识与情感内容注入家庭家教家风内涵之中。同时,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的社会支持、保

护与激励的制度环境。例如,通过进一步完善慈善法律法规,将慈善资金的使用过程和用途透明化、公开化,提升社会慈善的可行能力,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实现二者有机衔接。三是提升社会富裕感知与获得感、满足感。通过研究发现,一些社会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部分社会个体对自身所拥有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无感或低满足感。因此,帮助社会个体正视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及其价值,激发其生活的幸福感与满足感;突破个体生命体验的有限性,建设AR生活情境体验APP或体验馆,构建穿越时空的生命体验元宇宙,将不同年代、不同人群、不同国别的社会生活系统构建为AR虚拟场景,突显现代社会发展成就,帮助个体形成珍惜当下的认知。同时,引导正确的网络宣传,监管制造社会焦虑与误导社会心理认知的不良现象。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绝对的社会认知自在状态是不存在的,这里的“自在”表达的是社会主体在被影响而不自知的状态下的自我感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
[2](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M].林聚任,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
[3]贾玉娇.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J].社会保障评论,2023,(2).
[4]罗兴武.数字拟人品:数字技术、拟社会互动与商业模式内容创新的共演[J].管理世界,2024,(网络首发).
[5]唐小林.媒介:作为符号叙述学的基础[J].中国比较文学,2016,(2).
[6]田养邑.克里希那穆提心灵镜像的教育演进[J].社会科学战线,2024,(3).
[7](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郑彦辉.数字利维坦:信息社会的新型危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3).
[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

【责任编辑:陈保林】

Dynasty*Zhang Xianzhong*

As early as the pre-Qin period, Chinese classics recorded plagues, and people at that time had recognized their epi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dangers.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en Wu Youke wrote the *Treatise on Epidemic Infectious Disease* that China had its first monograph on epidemiology. After the Qing Dynasty, the *Treatise on Epidemic Infectious Diseases* was continuously reprinted and revised, and many works that explained, supplemented, or edited it were also published. Meanwhile, doctors in the Qing Dynasty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new plague-related books. Various social forces, including bookshops, authors and their descendants, officials and guilds, participated in the print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se plague-related books, with many publishers distributing the books for free or encouraging reprints. All these efforts were also crucial part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relief. The extensiv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plague-related books further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plague theories. Additionally,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of these plague-related books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disasters caused by plagues on huma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responses of the stat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during outbreaks.

(6) The Diverse Cogni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Achievement of Consensus*Jia Yujiao*

The social consensus on common prosperity serves as the spiritual core for building a society oriented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and acts as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advance along a new path that transcends the established path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overal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notations of common prosperity suggest that in a complex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under restrictive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based on a limiting developmental foundation, the process of practic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inevitably fraught with numerous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In this context, tensions between social cognition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social cognition an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s well as the objective limitations and subjective transcendence of social cognition are intensify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mechanisms for shaping social consensus—such as cognition shaping, environmental shaping and perception shaping are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resulting 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ocial cognition regard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order to guide society toward consensus on basic, foundational, principled and directional issues, while allowing for cognitive differences at specific levels and dimensions that do not affect the minimum level of social cohesion and unity. By focusing on the selective and differentiated interpre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formation by multiple subjects, collating the concerns and discourse patterns of different subjects regarding common prosperity, elucidating the reasons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gnition on common prosperity, it subsequently proposes ideas for building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o achieve this goal under the “powerful conditions” an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reaching a consensus on common prosperity.